



全国政协委员高培勇：促进共同富裕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书记高培勇

本报记者 杜丽娟 北京报道

2022年全国两会已落下帷
幕。3月7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五
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全国政
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党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
委书记高培勇做大会发言。

围绕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历史进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效
率和公平的关系,高培勇在接受
《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共同富裕是由“共同”和“富裕”两
个词组成,“富裕”意味着需要把
蛋糕做大,因此要重视效率。而
“共同”则体现着公平,这要求把
蛋糕分好,作为辩证关系,做大蛋
糕和分好蛋糕同样重要。

差别化的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收入分配结构。

《中国经营报》:关于共同富裕的话题,中央宣传部有关人士曾表示,共同富裕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不搞“杀富济贫”,在新发展阶段,你如何理解这种观点?

高培勇:促进共同富裕要靠全体人民共同奋斗。共同富裕是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收入分配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追求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但公平与平等其实不是一回事。平等是一种状态的描述,公平则附加了价值判断情况下对平等状态的认识,结果公平意义上的平等

固然重要,但不能只关注结果公平而忽略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

相对而言,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较之结果公平更为重要。共同富裕不是也不应当是绝对平均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确实可以在短时间内拉平收入差距,但其结果会更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因而不可持续。

特别是在个人能力禀赋存在差异的现实社会中,绝对平均主义就是典型的平等但不公平现象,因为它抹杀了个体差异。尽管从结果上看貌似平等,但对于那些有创新能力和辛勤劳动的人则是不公平的。

如果有创新能力的人不再创新,辛勤劳动的人不再勤劳,整个社

会的经济发展就会陷入停滞甚至倒退。共同富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所以,我们所追求的共同富裕,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有差别的共同富裕。只讲效率不讲公平,不符合共同富裕原则,也背离社会主义初衷。

同样,只求公平不要效率,搞平均主义也是不可取的。只有在初次分配中体现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在再分配过程中体现结果公平,同时遵循公平原则实施三次分配,才可在保证公平的同时使其保有对创新和勤劳的激励作用,这样才能走向公平和效率的统一。

全局性视角

要促进共同富裕,必须坚持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并举,找到一条同时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发展路径。

《中国经营报》:中国已经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目前正在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在此背景下,你认为在解决贫富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方面,我们还面临哪些挑战?

高培勇:从国情出发,我国尚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距离高收入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这意味着,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发展、把蛋糕做大仍然是我们的重要任务,发展仍然是硬道理。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所追求的共同富裕,首先应当是富裕基础上的“共同”,而非“共同”基础上的富裕。

所以,共同富裕只能在坚持发展中加以实现,离开了发展这个基础,就谈不到共同富裕。要促进共同富裕,必须坚持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并举,找到一条同时兼顾效率

和公平的发展路径。

由于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全局性问题,因此它就不单纯是一个分配问题,而且涉及生产、交换、消费等,同时也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问题。

《中国经营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现实生活中,你认为这一目标如何推进?

高培勇:基于实现共同富裕所涉及的所有问题,如果我们寄希望于通过单一的分配制度调整而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或通过单一的经济制度变革缩小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那就有片面之嫌,其结果也往往难遂人愿。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还可能适得其反。

所以,围绕促进共同富裕的考量,不能只有分配一个维度,也不

分阶段推进

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

《中国经营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站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和全局高度上,你如何看待促进共同富裕的意义?

高培勇:共同富裕是一个要分阶段加以实现而非一蹴而就的目标。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

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基于当前我国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较大的现状,从“十四五”到本世纪中叶,促进共同富裕是一个需要耐心、实打实把一件件事办好的长远过程。

在这一进程中,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改善收入和财富差距,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但与此同时,也要在缩小区域、城乡、居民收入和财富差距等方面,尽可能提高经济效率,做大经

济蛋糕,提高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

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不仅是为未来30年的经济发展,而且是为未来30年促进共同富裕设定的约束条件。

所以,面对这一绕不过且极其重要的约束条件,促进共同富裕既要注重公平,也要注重效率,二者不可偏废。立足于发展,努力在高质量发展中逐步缩小区域、城乡、居民收入和财富差距,是走向共同富裕目标的必由之路。

全国政协委员张宇燕：世界经济最大的短期风险是政策风险

本报记者 裴昱 北京报道

当前,俄乌冲突升级,大国博弈加剧,外部环境越发趋向复杂多变,全球主要大国或国家集团之间的竞合关系正处于深度调整期。

当这样的调整作用于经济领域,现有的世界经贸格局将面临不同程度的考验。面对逆全球化的端倪,在气候变化等有着共同利益的领域,各国之

间如何博弈与合作;供应链与价值链应该如何调整甚至重构,中国在其间的风险与机遇几何,这些都是全球治理不可绕过的命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长期在世界政治经济领域进行深入研究。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他接受了《中国经营报》记者的专访,在他看来,短期内世界经济面临的最

大风险主要是美欧货币政策转向带来的风险,以及不断反复的疫情和地缘政治冲突。中长期看,影响未来世界经济走势的因素除了供应链外,还涉及人口、技术进步、能源转型、贸易投资体系等因素。当各方都在积极推进或调整对外战略以应对新的国际局势时,中国要坚持扩大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俄乌冲突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取决于战争走势

资产价格因政策转向出现大幅波动,而股市、债市和房市震荡引起的溢出效应,势必波及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引发资本外逃和市场恐慌。

《中国经营报》:俄乌冲突仍在持续,这将对世界经济带来哪些影响?

张宇燕:关于俄乌冲突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目前有机机构预测可能会使全球经济下降0.4个百分点,损失约4000亿美元。影响肯定是负面的,但是到底会有多大,现在做出判断还为时尚早,因为这将取决于战争的走势,即持续时间与深度。如果现在就结束的话,比如俄罗斯停止军事行动,美国取消施加的新制裁,俄乌冲突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假定冲突大致维持在现有规模且持续时间不超过两个月,其负面影响应该十分有限,因为俄罗斯的经济体量比较小,只占全球的1.7%,而占全球产出约三分之二的美中欧日所受冲击不大。如果战事告一段落而西方国家对他制裁持续下去,从中长期来看,美欧日这些国家的立场更加接近,行动更加一致,其结果之一是对包括WTO在内的国际多边体系改革和区域合作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经营报》:近两年,全球“黑天鹅”事件频发,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你如何看待短期不确定性对世界经济趋势的影响?

张宇燕:我们已经看到了乌克兰事件对汇率、股市以及石油价格造成的巨大短期冲击。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

冠肺炎疫情的反复仍将是短期内影响今年全球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而且充满了不确定性。

除此之外,影响世界经济走势的短期因素还有几点。首先是发达经济体的宏观政策转型。今年2月美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7.8%,欧元区1月也超过了5%,这使得美欧货币政策不得不加速转型。美国和欧洲的央行都开始减少购债,未来一个月升息0.5个百分点已成为大概率事件。如果真如此,它将对2022年世界经济增长,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势头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稳定产生较大影响。摩根大通预测,今年的石油价格可能因供应链和俄乌冲突而冲到125到150美元/桶。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全球通货膨

胀率就可能达到7%,进而迫使发达经济体货币当局采取“急刹车”的政策,由此甚至会引发全球增长归零的风险。

同时,资产价格因政策转向出现大幅波动,而股市、债市和房市震荡引起的溢出效应,势必波及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引发资本外逃和市场恐慌。这些后果在历史上都曾出现过,并已经成为决策者们当下特别关心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被IMF看重的国际合作与政策灵活性,亦会因为俄乌冲突引起的国际社会分歧而受到损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上个月在G20财长会议上强调,强有力的国际合作和非凡政策的灵活性,是今年应对复杂经济局面的关键。

全球供应链朝逆全球化方向发展

中长期看,影响未来世界经济走势的因素比较多,除了前面提到的供应链因素外,还有人口、技术进步、国际货币体系演化、贸易投资规则、能源转型等因素。

《中国经营报》:疫情让人们意识到,重新评估价值链、缩短供应链或多元化供应链可能更有“钱景”,这是否会影响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该如何应对?

张宇燕:从大国博弈层面上看,全球供应链开始朝着逆全球化方向发展,当然,企业对供应链韧性的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供应链重组提供了动力。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今天的中国依然是跨国公司最看好的市场之一。

其原因首先是中国具有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网,几乎覆盖全部工业门类。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所处的这种位势,可以说是世界唯一。在全球500多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20多种的产量是世界第一,一些产业的领先优势逐步确立。其次,我们的市场是世界增长最快的市场。在2010至2020年间,我国实际GDP增量远超西方七国。这是中国的优势。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承认,中国部分产业存在对外依赖度较高的情况,中国制造业总体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有数据表明,在26类产业中,我国与世界高水平差距大和巨大的产业分别有10类和5类,占比57.7%;产业对外依赖度高和极高的产业分别有2类和8类,占比38.5%。很多卡脖子技术主要来自美国,从而对中国制造业形成了威胁。

有鉴于此,中国必须要持续且坚定地坚持开放政策,着力夯实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优势,促进技术创新和突破技术瓶颈,提升产业、产品和产业链上的位置优势,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国经营报》:无论是供应链的重构还是大国博弈的加剧,都可能对世界经济造成影响,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你如何判断未来的世界经济走势?

张宇燕:中长期看,影响未来世界经济走势的因素比较多,除了前面提到的供应链因素外,还有人口、技术进步、国际货币体系演化、贸易投资规则、能源转型等因素。

随着主要经济体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劳动力供给减少带来的潜在增长率下降,医保社保支出增加引起的财政压力也会长期拖累经济增长。许多研究表明,老龄人口的创新能力明显低于青年和中年人口。

技术进步既有促进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也有负向作用。正向作用表现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然而即使是正向作用,技术进步的影也相当复杂,它在对非熟练劳动造成冲击的同时,让一些知识密集型劳动被淘汰,其中精算师、信用评级人员等群体首当其冲,因为他们的工作都可以被计算机、人工智能替代。技

术进步降低人类参与工作的必要性已被一些研究所证实:随着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普及,未来5到10年,世界可能要减少1亿到2亿个劳动岗位。

从国际货币体系的角度看,2020年二季度疫情大范围流行到2021年一季度,这是世界上最恐慌、经济增速下滑最快的时期,然而同期美元指数却从100降到了90。以往经济状况不好、全球出现恐慌的时候,大家都寻求安全资产,结果往往是美元比价上升,但这次却在7个月之间下降了10%。这是历史上极少出现过的情况。今天人们再次热议未来国际货币体系问题,特别是美元未来地位问题,便与此有关。

美欧日等在对俄罗斯实施严厉金融制裁时没有全面封杀俄罗斯,顾忌去美元化蔓延也是原因之一。在全球治理方面,一些国家将治理政治化武器化,全球达成共识的难度会越来越大。多边贸易体系遇到挑战,如WTO改革困难重重,区域贸易投资合作却不断提升。这种多边弱化区域强化的局面面对全球的影响亦正负相伴。综合各种因素,从中长期来看,全球经济还处在中低速增长的轨道中,今后3至5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大致维持在3%至3.5%之间,同时各国各地区增速会存在显著差异。